

世经热点

增加产能竞争 扩充资金支持

韩国高调竞逐造船业

■ 本报记者 路虹

据英国造船和海运动态分析机构“克拉克森研究”3月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月韩国船企接单量排名全球第一,赶超中国。2月全球船舶接单量为341万修正总吨(CGT,100艘),同比增长18%。韩国承揽其中的171万CGT(50%),位居第一;中国承揽141万CGT(41%),位居第二。截至2月底,全球手持订单总量环比减少13万CGT,为1.2588亿CGT。中国和韩国的手持订单量分别为6223万CGT(50%)和3861万CGT(31%)。过去三年中国连续夺得全球造船接单量冠军,可以说,今年中国与韩国在造船业的竞争进一步升级。

韩国最近承接造船订单量反超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受到多方因素影响。

首先韩国政府和造船企业努力提升造船竞争力,并予以资金支持。3月5日,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表示,韩国组建了政府参与型合作平台“K-造船新一代倡议”,就造船业大转型方向进行讨论,探讨了船舶出口和确保技术优势的有关战略。韩国政府和造船企业三巨头、造船海洋成套设备协会在会上签署了《确保韩国造船业超级差距竞争力的联合应对合约》,其政府未来五年将携手HD韩国造船海洋、三星重工、韩华海洋三家造船巨头投资9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86亿元),争取进一步扩大造船产业技术领先优势,掌控造船领域具有“超级差距”的技术。

其次是中国造船业在与韩国技术质量服务等竞争力水平差别不是很大的情况下,价格更有吸引力,使得中国造船企业接单量爆满。去年中国船舶集团江南造船副总经理林青山曾表示,公司民船订单已经承接了大概300亿元人民币,2026年产能已经全部接满,2027年的接了快一半,甚至有些生产线已经排到

2028年。中国扬子江船业相关负责人称,目前订单排期已到数年之后,船坞利用率也达100%。江南造船、广船国际、招商工业等国内主要国有船厂交付期均已排到2027年。对于中国主要船厂而言,目前很难有足够的产能承接更多新船订单。船舶经纪公司Intermodal的研究分析师Chara Georgousi认为,目前中国最大的10家造船厂已经满负荷运转,在2025年-2026年的交付船台几乎售罄。这使得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部分国际订单转移到韩国造船企业,使其订单量回升。

另外,韩国重启国内外造船产能。韩国船厂产能的增加主要为之前关停船厂的重启,包括大型船厂厂区重启和中小型船厂私有化后重新投入造船市场。此外,为应对国内招工困难、劳动力工资上涨、中国船厂竞争加剧等挑战,韩国大型船厂企业重新把目光转向海外。去年韩国现

代重工在越南对已有船厂设施升级实现产能增加,同时在中东地区以合资建厂等形式加强合作,满足该地区能源出口运输需求。未来这部分产能的增加也不容小觑。但韩国造船竞争力仍存在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难题。

一是造船业劳动力不足。韩国政府近年来一直通过放宽工作签证,扩大外籍劳动力引进规模,以缓解造船业劳动力严重短缺的压力,然而收效甚微,长期劳动力不足更使得船舶交付延迟成了韩国造船业提心吊胆的心病。

二是韩国央行利率在3.5%,远高于中国一年期2%的银行利率。造船业是个高贷款高融资行业,而且建造周期往往长达两三年,资金成本是造船业的主要成本之一,由此银行利率高低极大影响船舶最终的售价。在韩国银行利率高企的情况下,韩国造船企业承受资金更高的成本压力,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竞争力。

星闻世界眼

德国大罢工或将拖累整体经济。由于德国机车司机工会(GDL)举行大规模罢工,德国3月7日只有20%的长途列车正常运营。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汉莎航空的空乘人员工会也要求员工在3月12日和13日进行罢工。德国3月以来的罢工风潮正愈演愈烈。德国经济专家称,罢工每天预计会造成高达1亿欧元的经济产出损失。造成德国近期频繁罢工的原因包括近年来的持续高通胀和经济陷入衰退,此外劳动力短缺也加深了德国国内劳资矛盾。据悉,德国铁路货运公司每天发送多达3000列货运列车。罢工对发电厂、炼油厂、化工厂和汽车制造商的冲击尤为明显。由于欧洲十个大型铁路网中,有6个经过德国,因此罢工还影响到周边国家。德国航空和铁路业的罢工有可能拖累整体经济。数据显示,1月德国国内工业新订单环比下降11.2%,国外新订单环比下降11.4%,其中来自欧元区的订单环比下降25.7%。

德国罢工风潮不断 日本实际工资下降

■ 本报记者 刘旭

拜登正式签署拨款法案。3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4600亿美元的政府拨款法案,为部分政府机构和项目提供资金至9月30日,以避免美国政府陷入“停摆”。该法案的通过意味着美国2024年财年的拨款程序已经完成了一半。美国国会现在还需要就剩下六项拨款法案进行谈判,为国防部、劳工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土安全部等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拜登在2月签署了一项短期支出法案,使在3月1日午夜到期的联邦资金延长一周,并为其他政府机构设定了3月22日的拨款截止日期。因此,剩余的六项拨款法案需要在3月22日之前通过,否则美国国防部、国土安全部等机构将面临“停摆”。

日本实际工资连续多月下降。日本厚生劳动省3月7日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1月日本实际工资收入同比下降0.6%,连续22个月同比减少。

此前公布的统计数据也显示,2023年日本劳动者实际工资收入比上年下降2.5%,连续两年下降。虽然日本春季劳资谈判结果对工资增长可能产生积极影响,但工资上涨仍存在一定阻力。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表示,央行将重点关注工资谈判的结果,以及企业是否会通过提高服务价格来转嫁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以决定何时逐步取消刺激措施。

图片新闻



图为印度尼西亚加达哈利姆高铁站,民众在人工售票窗口咨询。据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消息,截至3月3日,雅万高铁累计发送旅客突破200万人次,单日旅客上座率最高达99.6%,客流持续保持高位态势。中新社供图

虹桥话苑

IMF:SDR改革亟待破局

■ 陈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能够快速有效创造流动性的超主权国际货币。与基金组织贷款相比,SDR无需偿还、不会加重债务负担,在一定限度内可以随时兑换成SDR货币篮子中的五种硬通货(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用于偿债、质押或支付,且使用不受任何附加政策条件约束。鉴于其突出优势,SDR一直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应对流动性危机、稳定国际收支、创造财政资源、维护金融安全网的重要国际储备资产,SDR分配也成为近期全球南方政治议程中的首要议题。

自1969年设立SDR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分配了6607亿SDR,相当于约9430亿美元,包括四次一般分配和一次特别分配:1970年-1972年每年分期分配93亿SDR;1979年-1981年每年分期分配121亿SDR;2009年8月分配1612亿SDR;2009年9月特别分配215亿SDR,以解决1981年之后加入基金组织的成员国从未获得SDR的问题;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应国际社会强烈要求,基金组织于2021年8月分配4560亿SDR,价值6500亿美元,成为基金组织史上额度最大的SDR分配。2023年12月基金组织理事会完成了第十六次配额审查,批准将成员国配额增加50%,即

2386亿SDR,价值3200亿美元,并承诺将于2024年年底完成SDR分配。

然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阀”治理模式下,SDR须按照基于经济实力的配额分配,导致大部分SDR资源流向了最富有、对流动性需求最低的发达国家,并被闲置在其中央银行或财政部账户中无处可用。在2021年的SDR分配中,美国获得了17.4%的SDR资源,七国集团共获得了43.5%的SDR资源,发达国家共获得了58.8%的SDR资源。而占世界人口80%以上的全球南方,尤其是最容易发生流动性危机的贫困国家能获得的SDR资源却十分微薄——所有非洲国家加起来仅获得5.2%的SDR资源,低于德国一国获得5.6%的SDR资源,46个最不发达国家加起来仅获得3.2%的SDR资源,与意大利一国获得的SDR资源持平。

事实上,SDR分配的时间和配额均由美国决定。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0个成员国之一,美国却拥有16.5%的投票权,即对于基金组织重大事件需85%以上投票权通过的决策机制而言,美国对包括SDR分配在内的所有关键决策均拥有一票否决权。早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即遭受大规模资本外逃的严峻影响,3月贸发会议呼吁立即实施对全球南方的25亿美元救助计划,5月联合国高级别活动上明确支持增发价值1万亿美元SDR并得到基金组织

大部分成员国赞成,但遭到了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强烈抵制,直至2021年1月拜登执政后才批准了SDR分配,8月基金组织理事会批准拨款。换言之,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18个月后,SDR才被计入基金组织成员国账户。

可见,对于全球南方而言,SDR来得永远“太少”和“太迟”,SDR配额改革同样遥遥无期。自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七次修正案通过了配额和投票权改革并在美国国会延宕审批下直至2016年生效,全球南方多获得6个百分点SDR配额,成为基金组织史上最大规模有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权力调整,此后,配额改革一直陷入停滞。2023年10月基金组织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年会,其自1973年在肯尼亚内罗毕举办年会的50年来首次重返非洲大陆,国际社会对此寄予厚望,认为其将宣布重大改革举措以缓解全球南方融资的结构性不平等困境。然而,年会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改革进展,基金组织还宣布将配额改革推迟到年末。至2023年12月基金组织完成第十六次配额审查后再度宣布,关于出台调整配额比例的方案将继续推迟至2025年年中,并在第十七次配额审查周期开展工作,即完成配额改革将是五年之后的2028年。基金组织配额改革重新陷入僵局,意味着全球南方最

关注的SDR分配调整再次落空。

鉴于长期以来SDR分配的不公正,联合国多次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进行SDR特别分配并调整SDR一般分配机制。早在2012年联合国即强调基金组织应额外贡献价值1000亿美元的SDR用于资助发展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且至少三分之二应分配给全球南方。2015年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第三届联合国发展融资会议要求基金组织每年特别发行价值2500亿美元的SDR,并按需分配给全球南方以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023年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上巴巴多斯联合发布的“布里奇倡议”以及联合国在《我们的共同议程》框架下的政策报告均指出,SDR分配应与基于经济实力的配额脱钩,实现按需分配,提升SDR发行的及时性 and 自动化程度并防止政治拖延,通过多边开发银行建立SDR转借机制以发挥乘数效应,用SDR为专门的气候基金提供部分资本,并呼吁发达国家自愿捐赠或捐赠部分SDR。

在即将于2024年9月举办的联合国未来峰会和2025年召开的第四届联合国发展融资会议的筹备过程中,SDR改革再次成为备受瞩目的核心议题。作为全球危机管理的重要工具,SDR改革能否突破僵局并取得根本性进展,尚需全球南方团结一致共同努力。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研究员)

北极国家加快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

■ 本报记者 何诗霁

中国海洋大学极地法律与政治研究中心与社会学文献出版社日前共同发布了《北极蓝皮书:北极地区发展报告(2022)》。报告指出,北极国家相应调整国内能源政策,通过加大本国自主能源供应、促进能源进口多元化等途径以减少外部危机对本国的消极影响,同时也稳步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以期实现本国脱碳目标。

报告称,北极国家调整能源结构是为了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加速推进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北极国家能源供给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俄罗斯开拓新兴能源市场,出口重心向亚洲转移;挪威、美国通过向欧洲出口液化天然气以填补欧洲能源供给缺口;电力供应系统较为发达的北极国家则通过与周边国家开展合作,建设电力供给网络缓解能源危机。

报告指出,北极国家作为北极理事会的核心成员,高度关注北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北极国家更新了气候目标,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政策以实现脱碳转型。这些政策强调发展可再生电力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交通、建筑、工业等部门的电气化,也将氢能作为关键技术路径。北极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在减少北极地区碳排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助于引领北极航运部门的绿色转型,也推动北极理事会关注氢能等新兴能源技术,同时对为北极国家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制定奠定了话语权基础。

此外,报告还分析了北极国家在科技治理方面呈现的新变化。当前北极科技治理既呈现国际行为体多元并存、国际合作阵营进行、全球性议题重要性上升的新变化,也面临着新双边科技治理机制出现、多边治理平台停摆、重点议题亟待协商的发展趋势。

报告指出,北极国家开展北极科学外交主要集中在科学基础设施、科学教育合作、具体领域的科学合作三个方面。受制于当前北极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一些具体合作项目进度缓慢,部分科学合作甚至中断,北极国家之间缺乏科学合作的信任基础,科学外交受到阻碍。北极域外国家的北极科学外交历经20多年的发展,逐渐具备参与主体多元性、开展维度多样性和实施形式多样性的特点,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表现为域外参与者增加、机制化和区域化趋势增强以及灵活度提高等方面。

当前,在破冰船领域,各国虽然都有雄心勃勃的破冰船建造计划,但整体进展缓慢,短期内难以打破俄罗斯的绝对优势地位。在通信系统领域,各国的需求与能力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卫星通信和国际合作是未来一个时期各国北极通信系统建设的重点方向。在实验装备领域,装备的自主化、智能化趋势日益显现,这给了传统的北极科研弱国弯道超车的机会。